

# 在差异中共进：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关系

——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比较

黄学胜

**【摘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立或差异论的语境下,有关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的学术思想关系研究体现为观点不一甚至相互对立,没有合理阐明并评价二者的真实关系。秉持思想史研究态度,借助细致的文本比较可以发现,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领先于马克思,促进并推动了后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马克思则在哲学高度优于恩格斯,应当在哲学逻辑和经济学批判逻辑相互作用的视域中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及与恩格斯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差异中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抬高或贬低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经济学逻辑;哲学逻辑

**【作者简介】**黄学胜,男,江西赣州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广东 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及其意义研究”(19BZX008)。

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的学术思想关系,是一个有待展开的研究课题。一方面如卡弗所言:“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的影响,虽然被普遍承认,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被深入考察过。”<sup>①</sup>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即使有较为详细的考察,得出的也是恩格斯落后于马克思或马克思落后于恩格斯,甚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错误观点。这种不同乃至对立,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真实的学术思想关系处于迷雾之中。在广泛影响的“马恩对立论”语境下尤其是这一路径在21世纪有死灰复燃的情形下,以及在纪念恩格斯诞生200周年之际,以《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研究对象,回应上述问题,真实再现二者的学术思想关系并给予恰当评价,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在此,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大纲》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又在何种意义上超出了恩格

斯影响的限度,进而回答二人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过程中的应有地位。

## 一、走出非此即彼的理论误区

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的学术思想关系是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或差异论研究路径下得到呈现的。传统的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不认为二人有何差异或对立,而是认为二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差异或对立论是随着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对恩格斯的批评以及《手稿》于1932年的公开发表开始的,并在以吕贝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兴起和基于MEGA<sup>2</sup>的文献学研究中,得以壮大和影响深远。正是在这种差异或对立论的语境下,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的学术思想关系得到了大量关注,但也使其真实关系晦而不明。

国外学者大多承认青年恩格斯对青年马克思有影响,但在影响程度和内容方面观点不一。弗·梅林

大概不知道《手稿》的存在,在其所著的《马克思传》中未见他对《大纲》和《手稿》之关系的说明。但在戴维·麦克莱伦所著的《马克思传》中,则明确认为马克思对《大纲》的阅读“标志着马克思一生中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sup>②</sup>。在另一著作中,他又认为《大纲》“对马克思发生了决定性影响,比恩格斯本人所谦逊地承认的要更大些”<sup>③</sup>。麦克莱伦除了指出《大纲》让马克思产生研究经济问题的兴趣并认为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之外,并没有在内容方面有详细论述。由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的《恩格斯传》相对客观地梳理了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各自的思想发展,且相对公正地指出《大纲》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起到了“宝贵的推动作用”<sup>④</sup>。但除此之外,也依然没有内容方面的详细考察。科尔纽在其所著的《马克思恩格斯传》中强调了马克思受到恩格斯《大纲》的启发,也考察了其内容,但他认为《手稿》的出发点和基础都是全面阐述其共产主义世界观,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是实现共产主义路径上的启发<sup>⑤</sup>。在他看来,“受到这篇文章启发的马克思开始确信,只有从阶级斗争和经济的相互联系中才能推演出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sup>⑥</sup>。尼·拉宾则认为,恩格斯的《大纲》“是促使马克思进行经济学研究的直接动因之一”<sup>⑦</sup>,这本著作之所以让青年马克思特别钦佩,是因为“该书的革命目标”,在这里,马克思“找到了恩格斯这样一个在基本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上同他意见一致的人”。<sup>⑧</sup>日本学者城塚登认为,恩格斯的《大纲》给马克思提供了“直接的启迪”<sup>⑨</sup>。但这种启迪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他同样没有给出任何说明。总之,这些观点大多承认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影响,但在影响的程度、内容方面意见不一,实际上如卡弗所言并没有详细考察二者的思想关系。

在对二者进行详细考察的研究中,有两种观点对立实则性质相同的路向值得严肃对待。一种以自称马克思恩格斯激进对立论者的诺曼·莱文为代表,他认为青年马克思优于恩格斯,甚至贬低恩格斯;另一种以被称为温和对立论者的特雷尔·卡弗为代表,他提出青年恩格斯优于马克思,青年马克思落后于

青年恩格斯。两种观点实质上都攻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制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分裂与对立。其视角独特,但结论并不可靠。

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中,诺曼·莱文主张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来不是一体的,实际上二人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在《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一书中,他围绕二人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提出这两种主义的分界点是1842年。<sup>⑩</sup>即从1842年开始,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其实在内容实质方面已经分道扬镳了。因此,针对那种认为恩格斯的《大纲》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观点,他明确提出“它对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影响不大”<sup>⑪</sup>。在该书中,莱文还用大量的有损人格的语言评价恩格斯,说恩格斯“从未完成他的高中教育,未能进入大学,而这种高级学术训练的缺失,使他终生的学术事业有所残缺”<sup>⑫</sup>,还说他“缺少学术技能,缺少准确描述理论体系的必要的哲学能力”<sup>⑬</sup>,并且“分析能力不足”<sup>⑭</sup>，“在学术上是一个业余爱好者”<sup>⑮</sup>,等等。其话语背后是对青年恩格斯学术能力及其对马克思影响的否定,凸显了青年马克思优越于青年恩格斯。但问题是,莱文有关二人处理黑格尔哲学上的差异观点尚待商榷,且其基于二人的这种差异就断定恩格斯的《大纲》对马克思“影响不大”,是武断的,不仅否定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还不顾马克思自己在《手稿》中承认的受恩格斯《大纲》的影响这一事实。这已不是在强调二者的差异,而是刻意制造二者的对立了。

相比于莱文,卡弗的态度要谨慎得多。他在处理二人关系的时候,不是强调马克思优于恩格斯,而是认为马克思此时是恩格斯的学生。他认为,恩格斯的《大纲》“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冲击,呈现在马克思面前的是对当时最精确的社会理论即政治经济学的入门导论”<sup>⑯</sup>，“它集作者的主观意图、所作的系统探讨以及清晰的辨别工作于一体,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已有的著述”<sup>⑰</sup>,当中对政治经济学的探讨超出了

青年黑格尔派和共产主义者在这一领域的认识,其“资料丰富却无情的批判性方法一定大大地吸引了马克思,而此时马克思以典型的彻底性,刚刚开始以长篇阅读甚至翻译的方式补习当代政治经济学这个科目”<sup>⑧</sup>。他还具体考察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影响的诸多方面: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主题后来成为《资本论》的副标题;其中讨论的“矛盾”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具体探讨;马克思《资本论》开头讨论的“庞大的商品的堆积”的话题就是恩格斯提出的话题;恩格斯对土地的“地租”“资本家及其利润”和劳动的“报酬”的范畴分析,也是马克思《手稿》中的三个基本范畴——“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恩格斯对自然科学作为工业中技术运用的一个范畴的观点也预示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前提”;恩格斯的结论几乎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发现的“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本身;在马克思不断谈到的未来社会关系方面,恩格斯也以他批判性的缄默独特地超越了马克思;等等。总而言之,《大纲》“表现出了完全超出马克思当时成就的一些文学知识和分析技能”<sup>⑨</sup>。恩格斯是“相对于马克思发展的一条捷径,是马克思进一步探索的巨大灵感,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历史和运作的支持材料的有用源泉”<sup>⑩</sup>。借此考察,与莱文突出强调青年马克思的优越相比,卡弗却把青年马克思的独特性弄丢了,认为此时的马克思完全是跟从了恩格斯的思想。尽管如此,卡弗依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但广松涉却将卡弗的路径极端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恩格斯的创见,这就错误地把马克思清理出马克思主义阵营了。

综上所述,莱文的观点是否定青年恩格斯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卡弗等人的观点则是过于强调青年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影响,否定了青年马克思自己的理论努力。但是,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在《手稿》中亲自承认受到《大纲》的影响,也考虑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称恩格斯的《大纲》为“天才大纲”,并且提出他们二人从不同的道路得出一样的结果,共同决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算“之前”

的信仰这些基本事实,那么,上述两种极端观点就是成问题的。他们实际上有意制造了二者的分裂,使得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晦暗不明。而对此的解答,其恰当的方式当是悬置意识形态的偏见,秉持思想史研究态度,结合其思想历程及对《手稿》和《大纲》的文本比较来展开。

## 二、程度及内容: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影响

有鉴于马克思自己在《手稿》中的交待以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盛赞,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手稿》中的一大主题,受到恩格斯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恩格斯的《大纲》为何且如何影响了马克思以及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

首先,恩格斯此时对马克思的影响,其程度不是决定性的,以至于如卡弗和广松涉等人所认为的马克思此时作为恩格斯的学生完全没有任何独特性可言,这夸大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影响。这种影响应当在肯定马克思自己独特探索的前提下加以理解。它是局部的,只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而非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因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不仅承认恩格斯的影响,还交待说,自己大量阅读和利用了英、法、德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尤其提到了魏特林、赫斯的名字,还在正文中透露出对蒲鲁东著作和思想的熟悉,并以后者为批判对象。此外,马克思还交待他受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并且强调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具有经验主义性质且是通过国民经济的仔细研究得出的,这种路径可以在马克思对亚当·斯密、萨伊、李嘉图等人著作的大量摘录和评论中得到证明。这些交待一方面说明,马克思《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受到了多种思想资源的影响,是马克思自己对多种思想资源包括恩格斯的资源的综合创造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那种将此时的马克思完全视为恩格斯学生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恩格斯对马克思影响的程度及其具体内容应当得到重新理解和定位。

其次,关于马克思为何会受到恩格斯的影响,或

者说为何马克思会特别看重恩格斯的《大纲》，可结合青年马克思独特的思想发展来说明。正如不少论者指出的，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成长和关注的方面是不同的。青年马克思经受了专业的学术训练，一开始是打算往学术道路发展的，且长期沉浸在启蒙的理性主义和德国观念论的影响下，其思想发展主要是从哲学思想领域的突破开始的。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前，马克思的眼界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都把注意力放在用启蒙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批判德国落后的社会现状上。只不过，青年黑格尔派几乎把所有精力耗费在他们认为的德国的问题本质是宗教批判的问题上。马克思则更加激进，希望将宗教批判与德国落后的社会现实批判关联起来。问题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依然信奉的是用先进的但本质上是抽象的理论去批判现实的逻辑，把现实中的物质利益问题看作不法和粗陋的，没有认识到物质利益对于思想本身的前提和基础性作用。这种特点本质上也是德国观念论固有的缺陷，即普遍轻视社会经济问题。这就使得他在面临现实生活中被期待为“自由的圣经”的“法”反而成了利益的“手”和“脚”的时候，注定是倍感困惑的。为了解答疑问，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广泛深入研究各国的社会历史，并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的逻辑神秘主义，认识到市民社会相对于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地位。此时，与自己的老师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批判就是政治批判不同，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明确区分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及其关系，特别批判了费尔巴哈过于强调自然而过少关注政治，提出了须将宗教批判上升为对产生宗教之基础的政治、国家与社会的批判，以及通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将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上升为人类解放的思想。借此，其立场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概言之，在《手稿》正式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已经明确了必须抛弃之前的用抽象理性批判现实的路径，而采用通过市民社会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来展开，才能最终带来人的解放。换言之，马克思此时已

经产生了强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诉求，但由于他长期偏重哲学路径，还缺乏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因此在面对这一新的课题时再一次显示了知识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恩格斯的《大纲》受到了马克思的特别关注。

恩格斯的《大纲》之所以会被马克思特别看重，不仅是由于恩格斯率先展开了这一马克思正欲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还由于恩格斯的批判路径独特、极富创见，其工作不仅领先于马克思，还领先于当时绝大多数的同时代人。包括马克思在内所有的恩格斯的的同时代人，几乎停留在用各自的哲学立场批判社会，恩格斯自己则深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部，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分析及其私有制前提来展开批判的，且极有说服力地展示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及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走向灭亡和社会革命爆发的可能性。恩格斯借此也对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进行了激烈批判且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即超越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就为马克思展现了一种与其本人截然不同但本质上又能得出相同结论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路径。这种路径对马克思而言是新鲜又可靠的，闪烁着天才的光芒，自然会得到马克思的大加赞赏。总之，从不同的方式和路径出发，恩格斯与马克思最终站在了同一历史高度，从此有了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事业。也正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一改之前对恩格斯的冷淡态度，高度肯定了恩格斯的工作，并且不自觉地运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应当指出，恩格斯的路径自然是与其未受过严格的学院派教育且长期处于社会生活的内部，通过实际调查和经验分析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有关。因而恩格斯的这种特殊经历不应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反而是应当被高度肯定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特殊经历才让恩格斯领先于当时其他人的类似批判。与恩格斯相较，大多数青年黑格尔派还停留于宗教批判和唯心主义哲学中不能自拔，绝大多数的空想社会主义则基于抽象人道原则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抽象批判，这些批判都没有恩格斯的批判有说服力和感染

力。也正因此,恩格斯给马克思以极大启发,实质上推动和促进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以为,麦克莱伦认为的阅读恩格斯的《大纲》“标志着马克思一生中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是成问题的,因为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兴趣不是恩格斯引起的,而是他在《莱茵报》时期遭遇的思维困境激发出来的。他要解答令自己苦恼的疑问,就必然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恩格斯只不过帮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上加速前进了一段。同样,张一兵教授所提出的“马克思在青年恩格斯、赫斯和蒲鲁东影响下开始研究经济学”<sup>⑧</sup>,也只能在马克思当时已经有了强烈的研究经济学的理论需求才是部分正确的。严格来讲,是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发展到要研究经济学的阶段,才开始关注恩格斯、赫斯、蒲鲁东等人的著作。与此类似,列宁所提出的“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sup>⑨</sup>,这一判断也不准确。马克思“下决心”研究政治经济学不是同恩格斯的交往导致的,而是实现人的解放必须展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批判这一理论任务决定的。至于科尔纽所谓的受恩格斯《大纲》在路径上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有启发更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手稿》写作之前,马克思已经确立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明确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形式来实现共产主义,而且从《手稿》和《大纲》的具体的文本比较看,他们提出的消灭私有制的路径其实也是不同的。恩格斯《大纲》对马克思的影响,其程度只在给予马克思极大启发,从而推动和促进了马克思《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

最后,恩格斯的《大纲》如何影响了马克思?具体内容又包含哪些方面?通过对《大纲》和《手稿》的细致阅读和文本比较,可以看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大纲》批判国民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认同和吸收的观点、表述、评价等。恩格斯将国民经济学判定为一门发财致富的科学,带有自私自利的烙印,这也是《手稿》认同的。恩格斯还将资本

主义制度定性为工厂制度,批判这种制度的非人道性和国民经济学家们的伪善和非道德性,这也是《手稿》的批判主题。马克思也批判了工厂制度把工人不当人看,描绘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普遍异化问题。《大纲》还考察了国民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对重商主义、亚当·斯密的经济学都有仔细批判,而《手稿》也考察了国民经济学这几个阶段,并且完全认同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例如,恩格斯批判重商主义的货币主义倾向,批判重商主义把金钱视为“世俗的神”的观点,这些都在《手稿》中有明确体现。马克思还完全认同恩格斯所提出的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路德”的判断,并且和恩格斯一样对古典经济学的世界历史意义及其问题给以客观评价。

第二,《大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是批判了其私有制前提,指出了现代工厂制度和国民经济学的一系列后果都是私有制前提下导致的后果,还明确提出只有消灭私有制,这些后果才能被克服。《手稿》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根本指向了其不自觉的前提,并且通过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的考察,来回答私有财产制度的由来及其问题,也提出要消灭异化劳动必须扬弃私有财产的观点。二人都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和天然性的科学,将对其的最终批判上升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批判。

第三,《大纲》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主要是通过批判经济范畴的形式展开的,这种批判路径也正是马克思《手稿》中所遵循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称赞《大纲》为“天才大纲”时,也就是恩格斯批判经济学的范畴而言的。<sup>⑩</sup>诚如卡弗所言,《手稿》中的“工资”“地租”“资本”的考察是受到《大纲》对这三要素的考察的启发。这是《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种批判逻辑,这种逻辑是受恩格斯的启发并通过国民经济学自身的语言来揭穿国民经济学的神话。

第四,《大纲》对经济范畴的批判主要是通过“竞争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的,即认为国民经济学使用的范畴都具有抽象性质,而这种抽象在“竞争关系”的

视域中却是虚构的。恩格斯从竞争关系角度考察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地租与资本的关系、生产费用和实际价格的关系等,这无疑也深刻启发了马克思。他对国民经济学抽象范畴背后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批判,从而扬弃了国民经济学所虚构的原始状态。此外,《手稿》中马克思同样根据供求关系来考察工人的状况,根据竞争关系来考察劳动、资本和地租这些范畴,并且和恩格斯一样得出了资本与劳动的分裂及其导致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分裂以及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对立这一相同的结论。这种考察方法同样延续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政治经济学各范畴的批判中。

第五,恩格斯《大纲》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路径不是哲学批判,而是具有经验实证性质的批判,这种批判性质也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序言”中特别声明,他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分析得出的”<sup>⑤</sup>。在阐释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时,马克思同样特意强调“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sup>⑥</sup>。这种具有经验实证性质的批判是马克思《手稿》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方面,是支撑当中哲学批判的底色,纯哲学的批判无助于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批判及其扬弃。

第六,恩格斯《大纲》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提出了科学进步的重要性,深信科学进步能最终解决问题。“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而对科学来说,又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sup>⑦</sup>但恩格斯同样还对科学技术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性质有说明,这种对待科学技术的基本态度是《手稿》中马克思所延续的。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将为人的解放奠定基础,同时也认为现有的科学还有非人的性质。“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sup>⑧</sup>

第七,恩格斯《大纲》基于竞争关系批判国民经济学,得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出现生产力过剩、人

类的堕落、贫困,还批判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必然会出现商业危机,并且主张用有意识的组织生产来反对这种无意识的无政府状态,否则会出现社会革命。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竞争导致大量的不幸和非道德,提出消灭私有制之后是回归真正的人的关系。这些与马克思有共鸣,马克思的批判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各种不人道后果及资本主义的灭亡的结论,并且认为扬弃异化就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还进一步明确人的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 三、经济学与哲学的激荡:马克思对恩格斯的突破

尽管有上述影响,但不应忘记在《手稿》中马克思是吸收和综合了众多思想资源的,并且初步提出了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当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不是照搬《大纲》的批判,而肯定有所不同。事实上,《手稿》中除了有受《大纲》影响基于经济学逻辑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之外,还有基于黑格尔哲学批判所取得的新哲学世界观展开的哲学批判维度。只有把握这双重维度,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及其此时超出恩格斯影响的具体方面,才能再现马克思与恩格斯二者的真实关系并给予恰当评价。

关于哲学维度,不少学者有揭示。前文莱文将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起来的重要理由就是基于二人哲学立场的不同。尽管费彻尔认为《大纲》对马克思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sup>⑨</sup>,但也认为二人哲学思想是有差异的。“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区别比《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时的恩格斯与黑格尔之间的区别更根本。一个是从其自身的诉求出发,克服、具体化、实现并扬弃了黑格尔,而另一个则仅仅是阉割了黑格尔。”<sup>⑩</sup>哲学立场的不同必然会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同。张一兵等教授曾指出《手稿》中的两种批判逻辑,即隐性的不自觉的基于经济现实研究的深入而展开的从经济现实出发的批判逻辑,以及显性的占主导性的基于费尔巴哈人本

学异化思想而展开的人本主义批判逻辑。<sup>③</sup>这一方面将经济学逻辑批判当成不重要的隐性逻辑,另一方面又将马克思此时的哲学立场定位为费尔巴哈哲学。费彻尔也认为《手稿》是以费尔巴哈哲学为方法论依据的。<sup>④</sup>这都值得商榷。

正如恩格斯后来回顾的那样,他本人此时无疑是个费尔巴哈派。他起先是青年德意志派,后来借助施特劳斯转向黑格尔哲学,又通过费尔巴哈转向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除了基于实际观察展开的批判之外,在哲学上使用的方法论原则即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他批判:“经济学中的一切被本末倒置了:价值本来是原初的东西,是价格的源泉,倒要取决于价格,即它自己的产物。大家知道,正是这种颠倒构成了抽象的本质。”<sup>⑤</sup>随后他又特别强调:“关于这一点,请参看费尔巴哈的著作。”<sup>⑥</sup>也正因为有这种影响,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道德批判,这可以从《大纲》中大量存在的“不道德”“贪财”“自私”等评价性话语中得到证明。但与此不同,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个费尔巴哈派。<sup>⑦</sup>《手稿》中的马克思也不是站在费尔巴哈哲学立场来颠倒黑格尔哲学,而是全面提出了感性对象性活动理论超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初步表达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全面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原则。

具体而言,《手稿》中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体现为,以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和黑格尔的精神原则,将人理解为从事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感性对象性的存在物,而不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的、直观的、自然的人,也不是黑格尔的抽象的、作为自我意识的人。马克思不是如黑格尔那样将社会历史理解为精神活动史,也不是如费尔巴哈那样视为人之抽象的、固有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而是将人视为从事对象性活动的现实的人即社会化的人和社会,将历史理解为在此基础上的人的活动的历史。由于感性对象性活动也就是人的具体的劳动或实践活动,因而马克思既突破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

也突破了费尔巴哈的半截子唯物主义的异化史观,提出了具有唯物史观性质的劳动史观或实践史观<sup>⑧</sup>,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成为实践的人道主义或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统一的新世界观。总体而言,在《手稿》中,基于哲学原则的革命,马克思初步提出了一种区别于包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哲学的新哲学思想,这就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这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预示的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实践相匹配的新哲学思想,也只有这种新思想才能跟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一致起来,而费尔巴哈哲学在本质上还并未超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边界。

这种哲学变革必然会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相互激荡,超出恩格斯的批判范围,从而使马克思的批判独具特点。恩格斯的批判尽管基于竞争关系有对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批判,但其价值立场则更多是道德批判,甚至对竞争关系的批判也更多是道德批判。他称资本主义的竞争是不道德的竞争,充满了伪善,是令人堕落的根源,但他并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自身的必然道路。马克思尽管也有道德批判的意味,但已经展开了社会历史批判和实践批判。恩格斯是从“物品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规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规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sup>⑨</sup>来论述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他还基于供求规律在逻辑上得出了资本主义会出现商业危机的结论,但这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此外,他对科学进步似乎给予了过度的信心,认为问题能够随着科技进步得到最终解决。这些都与马克思的批判有所不同。马克思首先区分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由于是以资本的增值为目标的,因此眼中只有抽象劳动,而无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但马克思认为后者才是财富、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历史的源泉。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这种活动一方面依然作为“源泉”起作用,私有财产(资本)、人的异化关系、竞争等本质上都是这种活动决定的。另一方面,这种作为“源泉”的活动又由于私有制的存

在而沦为异化劳动、雇佣劳动和被迫活动。因此,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作为私有财产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关系。马克思通过“工资”“资本”“地租”这三个经济范畴的批判分析,得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简单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即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当这对矛盾发展到顶点时就会导致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爆发。无产阶级社会革命通向的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解放即劳动解放。对马克思而言,共产主义消灭了异化劳动,扬弃了私有财产,人成为社会的人,人的活动和享受也成为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sup>⑤</sup>。马克思特别强调,“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sup>⑥</sup>,以此证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停留在“应当”立场上的道德批判,而已经是一种社会历史批判和实践批判。区别于恩格斯,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批判性质。费彻尔就强调,《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意味着(或者说批判并不首先而且仅仅意味着)以一种反复被绝对设定的道德规范的名义来进行的道德批判”,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判定为极端的、非历史的”,而是既考察了其历史合理性,又批判了其限度,还因此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因为后者“不能把自身的经济方式看成是历史性的”。<sup>⑦</sup>恩格斯没有达到将劳动视为社会历史运动的根源进而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运动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关系的高度,而马克思则从此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自身和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必然之路。

此外,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倚重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马克思当然也认同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sup>⑧</sup>,自然科学也将为人的解放奠定基础。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然科学使“非人化”充分发展,还具有“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

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sup>⑨</sup>,因此需要以关于人的科学与之相结合,实现在18世纪旧唯物主义未完成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相结合的夙愿。感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sup>⑩</sup>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能如恩格斯那样停留在提出消灭私有制的要求,而应该进一步在社会历史和实践的高度上揭示私有制得以消灭的可行道路以及往后发展的方向所在;也不应如恩格斯那样停留于对自然科学的片面倚重,而应补充关于人的科学的哲学思想。对此的真正理解,则只有在马克思实现了其哲学革命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概言之:如果说恩格斯领先于马克思,那主要是就其率先展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深刻启发了马克思而言的;如果说马克思领先于恩格斯,那主要是就其实现了对以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为代表的旧哲学的突破而言的。也因此,只有在经济学逻辑(主要受惠于恩格斯)和哲学逻辑(受惠多重资源)这双重逻辑相互作用的视域中,才能真正理解《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这里的哲学逻辑不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逻辑,而是建立在感性对象性活动或劳动基础上的新世界观。政治经济学批判自然推动了其哲学批判,而哲学批判反过来又深化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不是如恩格斯那样停留于费尔巴哈哲学立场和经济学批判逻辑,而是更为深入地将其新世界观与经济学批判逻辑相结合,得出了与稍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的基本思想。但退一步讲,如果没有恩格斯《大纲》的启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可能如此迅速而深入。因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而言,广松涉文献学研究失之表面,并没有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及其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变革的关联;莱文对恩格斯的否定也同样缺乏对《大纲》影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诞生意义的深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

二人有着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立场,又有着各有侧重的研究领域和问题意识,因而诚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的那样,他们二人是紧密合作的关系,共同推动着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抬高其中的任何一个而贬低另一个都是错误的。

#### 注释:

①①⑥①⑦①⑧①⑨②⑩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36、39、39、50、51页。

②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③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夷等译,陈启伟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6页。

④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易廷镇、侯焕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4页。

⑤⑥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II),樊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133、134页。

⑦⑧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232-233、233页。

⑨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尚晶晶等译校,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68页。

⑩⑪⑫⑬⑭⑮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臧峰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118、120、120-121、160、145页。

⑯⑰张一兵:《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本结构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⑱《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2、89、81、78、88、89、90页。

㊿㊱㊲㊳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66、66、65页。

㊿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185、37、37页。

㊿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余品华:《略论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不同影响》,《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㊿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具体论述,可参见林锋《重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沿为新探》第二章和第四章相关内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

## Progressing in Differences: Marx's and Engels's Early Thoughts: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Huang Xuesheng

**Abstract:**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Marx and Engels in their youth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researched.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the context of Marx and Engels's antagonism or difference theory,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points, some of which are even mutually contradictory, without reasonably clarifying and evaluating the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inkers. In line with the research attitude of ideological history, and through detailed textual comparison, we can find that Engels is ahead of Marx in the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advances the latter's political economic criticism, whereas Marx is superior to Engels in philosoph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i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Engels, we should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hilosophical logic and economic critical logic. The two thinkers jointly found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 is wrong to elevate one and downplay the value of the other.

**Key words:** Marx; Engels; academic-thought relationship; economic logic; philosophical logic